

钟润涛,马 强. 农村金融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9):271-276.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9.072

农村金融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

钟润涛,马 强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 110036)

摘要:基于 2000—2015 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 2 个方面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是农村金融规模、政府财政支农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是,农业信贷比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是。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农民收入表现出较弱的对长期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效应。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受到农村信贷比率、外出务工人员数、自身的正向冲击后,会有所提高;金融规模对农民收入冲击的影响有限,财政支农的冲击会抑制农民增收。最后针对结论,提出可通过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整合拓展农村金融服务领域、提高农业财政补贴效率、创造当地就业机会以提高农民收入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农民收入;农业劳动力转移;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 F830.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09-0271-05

“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农民收入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广大农民不能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虽大幅提升,但相比城镇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有很多,依照林毅夫的观点,从长远看,发展普惠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农村金融发展会优化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而提高农民收入^[1-2]。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基数较大,稳步提升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重点,事关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大幅提升,由 1978 年的 134 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0 000 元以上(图 1),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15 000 元。但从绝对收入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民收入水平虽大幅提高,但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的增速、增幅仍然较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更体现在收入水平的差别上。1990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为 824 元,截至 2015 年年底,城乡收入差距已扩大为 19 773 元,除了可统计到的收入外,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交通等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到的隐性收入更是远高于农村居民。

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贫困是我国长期以来农村改革的基本目标,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我国学者从财政政策、经济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然而无论何种措施都需要资金的支持,目前我国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的供给远远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和我国总体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相比,农村金融发展仍较为缓慢。我国的改革最早始于农村,但是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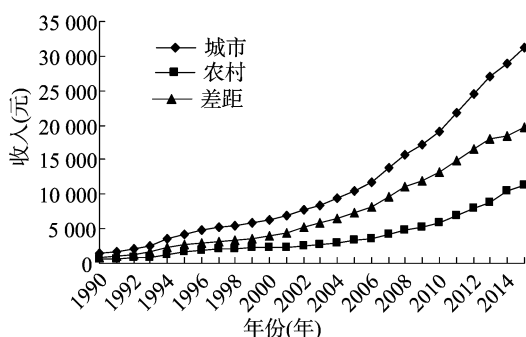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的金融改革相对滞后,甚至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农村金融非但没有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反而将农村储蓄用于城市发展,这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形成了一定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增加了自身的收入。本研究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视角,尝试通过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

1 文献回顾

一个经济体可以通过优化其金融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使居民收入提高,农村金融也是如此,作为金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村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3]。Greenwood 等通过建立动态模型对经济增长、金融优化、居民收入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优化和居民收入增长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先大后小的倒“U”形关系^[4]。Banerjee 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金融深化、经济发展不一定都能促进收入的增长,当金融市场不够成熟时,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抑制收入增长,他们认为成熟的金融市场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增加收入^[5]。Clark 等基于多个国家数据分析了

收稿日期:2016-08-14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编号:2015BS6)。

作者简介:钟润涛(1984—),男,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方向为金融发展理论与政策。E-mail:14789488@qq.com。

金融深化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结构会影响收入分配,从而间接影响居民收入^[6]。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和金融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学者针对农村金融发展与提高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有很多。林毅夫认为不同于城市金融,农村金融存在一定的弱质性,且发展落后于城市金融,这导致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贫穷现象较为明显^[7]。许崇正等从农村信贷、农民受教育水平、农产品价格等方面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关系,提出可以通过提升农村信贷水平、农民受教育程度、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8]。温涛等以 1952—2003 年度数据为基础,对我国金融整体发展状况、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和其他国家不同,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9]。杨小玲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对提升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民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且二者互不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金融效率能显著影响农民收入^[10]。谭燕芝以 1978—2007 年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农民收入对农村金融发展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没有影响,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会把当地的储蓄用于外地发展,而非服务于本地经济^[11]。余新平等以 1978—2008 年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提高农民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农村企业的贷款对农民收入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2]。李明贤等以 1990—2009 年数据为基础,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比、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数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民收入^[13]。刘玉春等以 1978—2012 年我国数据为基础,基于 C-D 生产函数对农村金融发展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农村金融发展能够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金融规模以及金融效率也能够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14]。

2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的相互影响机制

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增收之间可以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农村金融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来源及金融服务,有利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民收入提高对农村金融发展又具有促进作用,农民收入提高后,储蓄也会相应增加,有利于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进而更好地为农民和农村经济服务,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2.1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

(1)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拓宽农业生产的融资渠道,使农村居民获得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的大量资金。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长,收益率较低,金融机构开展农业信贷业务的意愿较低,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发展专业化、集约化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向农户融资,促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2)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在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农村金融服务可以通过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和保险服务,比如为水力工程提供长期贷款,为大型农具提供质押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3)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为乡镇企业提供金融资讯和服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就近务工,增加农民收入。(4)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从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用于提升自身农业生产技能和知识,进而提高农民人力资源素质。农民素质的提高会产生长期的回报,通过掌握农产品市场动态,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并提高自身收入。

2.2 农民增收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时,农民有限的收入只能用于维持日常生计,手中的闲置资金较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较小,使得金融机构的涉农业务量较小,农村金融机构的储蓄量也不高。农村金融机构会选择减少营业网点和服务人员数量以降低成本,网络覆盖率下降和服务水平也会相应下降。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农民手里的闲置资金增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增加,使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工作人员数量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得到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使得农民对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可以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吸储量,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促进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增收可以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共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3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通过引入 C-D 生产函数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间的关系,农村的金融发展水平被作为一项投入要素,农民收入作为产出。其表达式如下:

$$Y = AK^\alpha L^\beta$$

2 边同时取对数处理得到下式:

$$\ln Y = \ln A + \alpha \ln K + \beta \ln L$$

本研究所建立模型涉及 2 个方面的指标:(1)农民收入指标;(2)农村金融发展指标。为进一步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将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最终根据本研究的内容,将以上双对数模型写成如下形式:

$$SR_t = C + \beta_2 WD_t + \beta_2 XL_t + \beta_3 BT_t + \beta_4 WC_t + \varepsilon_t$$

式中: C 为常数项, β 表示各自变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 ε 为不能被模型解释的随机波动。

选取农民人均收入作为收入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指标通过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政府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几个方面加以描述。

(1)农村金融规模。金融的发展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一个地区的金融规模越大,通常这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居民收入也

越高。本研究使用胡俊等的方法^[15],用农村地区存贷款之和占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表示金融规模。

(2)农村信贷比率。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农村也是如此,因此,本研究把农村信贷比率作为农村金融指标之一,用涉农贷款与第一产业产值之比表示。

(3)财政支农力度。由于农业具有低产值、高风险,但对国家不可或缺的特殊性,大多数国家对农业都采取补贴政策。朱湖根等认为,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够提高农民收入^[16]。本研究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与第一产业产值之比表示财政支农力度。

(4)农业劳动力转移情况。农民外出务工现象在我国较为普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杜婕等选取农村人口总数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之差表示没有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综合考虑年龄因素后,使用农村未从事农业生产人口数的一半代表外出务工人数,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短期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17]。但该统计方法主观性太强,因此本研究使用国家权威统计数据,2008 年之前的农民工数量来自农业部抽样调查数据,2008 年及之后的农民工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虽然外出务工能获得更多收入,但必须也要意识到农民外出务工会带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一定利于社会发展^[18]。各变量的说明和标记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解释说明

| 变量 | 数据说明 | 标记 |
|----------|----------------|----|
| 农民收入 | 农民人均纯收入 | SR |
| 农村金融规模 | 农村存贷款和与第一产业产值比 | GM |
| 农村信贷比率 | 涉农贷款与第一产业产值比 | XD |
| 财政支农力度 | 农业财政支出与第一产业产值比 | ZN |
| 外出务工人员数量 | 农村到城市务工人员数量 | WC |

本研究以 2000—2015 年年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农民工数据来自农业部和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取对数。数据处理使用 Excel 软件完成,模型回归使用 Eviews 软件完成。

表 4 回归结果

| 解释变量 | 截距项(C) | GM | XD | ZN | WC | R ² | 德宾-沃森统计量(DW) |
|-------|---------|---------|-----------|-------|-----------|----------------|--------------|
| 系数 | 5.506 | 0.082 | 0.373 | 0.238 | 0.410 | 0.841 | 1.956 |
| t 统计量 | 1.803 * | 1.854 * | 5.792 *** | 1.153 | 4.906 *** | | |

注:同行数据后“*”“***”分别表示结果在 0.10、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由回归结果(表 4)可知,农村地区金融规模的系数为正且在 0.10 统计水平上显著,农村金融规模(GM)能够对农民收入(SR)产生正向影响,但效果不明显。财政支农力度系数(ZN)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信贷比率(XD)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WC)系数为正且在 0.01 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信贷比率和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能够对农民收入产生极显著正向影响。

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各变量和农民收入间的相互关系,分别用各变量和农民收入作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检验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 2 个平稳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各变量与农民收入的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3.2 平稳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防止出现伪回归,建模前须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研究使用单位根检验以验证数据的平稳性,按照赵进文的观点^[19],分别使用 ADF 检验、PP 检验做单位根检验,两者结果不一致时,以 PP 检验为准。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 变量 | SR | GM | XD | ZN | WC |
|------|----------|---------|---------|----------|----------|
| 原序列 | 0.831 | 0.496 | 0.591 | 0.549 | 0.777 |
| 一阶差分 | 0.001 ** | 0.012 * | 0.015 * | 0.004 ** | 0.001 ** |

注:以上结果为概率 P 值,同行数据后“*”“***”分别表示结果在 0.05、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2)可知,原序列在 0.05 水平上差异均不显著,各变量的原序列数据不平稳,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在 0.05 或者 0.0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3.3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前,使用 AIC 准则、SC 准则配合 LR 检验来判断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经检验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2。本研究使用 Johansen 方法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协整检验结果

| 原假设 | 特征根趋势值 | | | 特征根最大值 | | |
|---------|--------------------------|--------|-------|------------------------|--------|-------|
| | λ_{trace} | 5% 临界值 | 概率 | λ_{max} | 5% 临界值 | 概率 |
| 0 个协整向量 | 138.241 | 94.364 | 0.000 | 58.541 | 40.078 | 0.000 |
| 1 个协整向量 | 116.630 | 67.097 | 0.000 | 48.507 | 33.877 | 0.001 |
| 2 个协整向量 | 70.123 | 47.856 | 0.000 | 33.784 | 27.584 | 0.007 |
| 3 个协整向量 | 36.339 | 29.797 | 0.008 | 25.373 | 21.132 | 0.012 |
| 4 个协整向量 | 10.966 | 15.495 | 0.214 | 10.459 | 14.265 | 0.184 |

由 Johansen 检验结果可知,特征根的趋势值、最大值在 0.05 的统计水平上均存在 4 个协整关系,因此模型存在协整,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共关系,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各变量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5 格兰杰检验结果

| 原假设 | F 值 | P 值 | 结论 |
|-----------------|--------|-------|----|
| GM 不是 SR 的格兰杰原因 | 1.164 | 0.131 | 接受 |
| SR 不是 GM 的格兰杰原因 | 3.455 | 0.048 | 拒绝 |
| XD 不是 SR 的格兰杰原因 | 5.395 | 0.004 | 拒绝 |
| SR 不是 XD 的格兰杰原因 | 0.955 | 0.424 | 接受 |
| ZN 不是 SR 的格兰杰原因 | 1.371 | 0.143 | 接受 |
| SR 不是 ZN 的格兰杰原因 | 10.177 | 0.000 | 拒绝 |
| WC 不是 SR 的格兰杰原因 | 8.121 | 0.001 | 拒绝 |
| SR 不是 WC 的格兰杰原因 | 0.309 | 0.548 | 接受 |

由表 5 格兰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农村金融规模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农民收入是农村金融规模的格兰杰原

因;农村信贷比率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农民收入不是农村信贷比率的格兰杰原因;农业财政支出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农民收入是农业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外出务工人数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农民收入不是外出务工人数的格兰杰原因。

3.5 动态分析

考察完毕各因素和农民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使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各变量的短期波动对农民收入长期均衡的影响。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得到误差修正项 ecm :

$$ecm = SR - 0.192GM - 0.293XD - 0.128ZN - 0.461WC。$$

误差修正项 ADF 平稳性检验结果为 -5.681 ,结果通过了 0.01 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因此 ecm 平稳,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为:

$$\Delta SR_t = C + \alpha_k \Delta GM_t + \alpha_2 \Delta XD_t + \alpha_1 \Delta ZN_t + \alpha_4 \Delta WC_t + \lambda_{ecm_{t-1}} + u_t。$$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概念,为保障模型收敛,误差修正项的系数 λ 应小于零, u_t 为白噪音过程。误差修正分析的估计结果为:

$$\Delta SR_t = 1.563 + 0.206 \Delta GM_t + 0.102 \Delta XD_t + 0.328 ZN_t + (2.006^{**}) (1.996^{**}) (1.539)$$

$$0.463 WC_t - 0.104 ecm_{t-1} + u_t。$$

$$(6.397^{***}) (-2.691^{***})$$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 0.05 、 0.01 统计水平上差异显著。

由结果可知,短期内,农村金融规模、农村信贷比率、外出务工人数的变动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财政支农力度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明显。均衡误差项 ecm_{t-1} 表示一旦农民收入遇到外部冲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后,在随后若干时期内自动回归长期均衡水平的机制,均衡误差项的系数为 -0.104 ,说明农民收入回到长期均衡状态的速度为 0.104 个单位,表现出较弱的对长期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效应。当 $ecm_{t-1} < 0$,农民收入向下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 ΔSR 会大于零,导致 SR 变大,从而向长期均衡值回归;当 $ecm_{t-1} > 0$,农民收入向上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 ΔSR 会小于零,导致 SR_t 变小,从而也向长期均衡值回归。

分析完长期均衡关系后,使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农民收入受到外部冲击后的变化情况。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给系统 1 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系统所做出的动态反应。本研究分别研究了农民收入受到自身以及各自变量 1 个单位冲击后的反应,脉冲效应的输出结果如图 2 至图 6 所示。其中横轴表示冲击的滞后期,纵轴表示农民收入对冲击的反应程度,实线表示农民收入对冲击的反应路径。

由图 2 至图 6 可知,农民收入受到农村信贷比率、外出务工人数、自身的正向冲击后,会有所提高。农民收入受到自身冲击后,当期即做出反应,有所提高,随后开始调整,幅度减弱,在第 2 期后逐渐趋于稳定并在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稳态运行。农民收入受到农村金融规模正向冲击后,当期即有所提高,但随后冲击影响振荡减弱,最终回到初始水平,农村金融规模变动对农民增收几乎没有影响。农民收入受到农村信贷比率冲击后,即期没有响应,随后逐渐调整,在 4 期之后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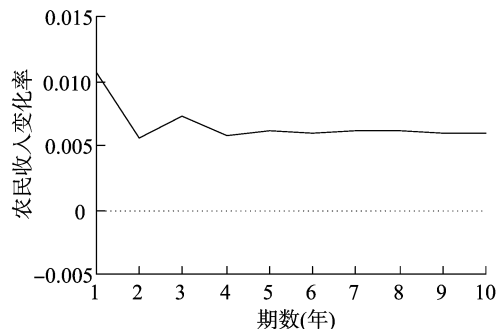


图2 农民收入受到自身冲击后的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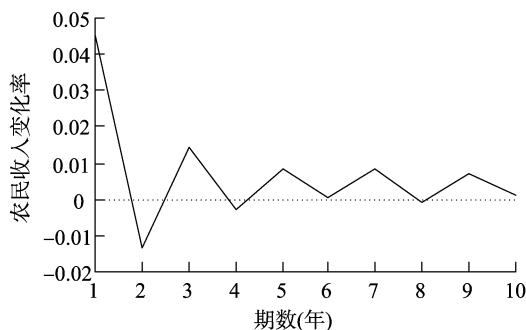


图3 农民收入受到农村金融规模冲击后的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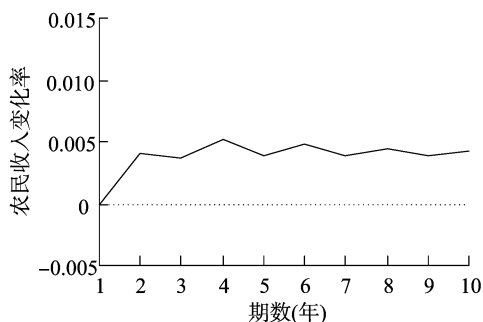


图4 农民收入受到农村信贷比率冲击后的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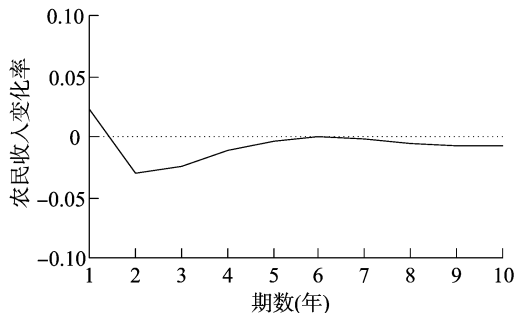


图5 农民收入受到政府财政支农冲击后的响应

步达到稳态,在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稳态运行,农业生产通常周期较长,从农村信贷比率的提高到农业产值增加、收益提高,最终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民收入受到财政支农冲击后,除即期有所改善外,之后并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说明我国财政支农的效果不佳。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民收入的冲击类似于信贷比率,受到冲击后,逐步调整到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稳态运行,说明外出务工人员的工作熟练度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工作熟练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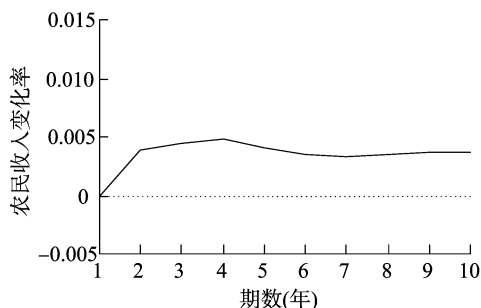


图6 农民收入受到外出务工人员冲击后的响应

5 结论及对策

本研究选取 2000—2015 年我国农村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 2 个方面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间的关系,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能够相互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1)农村金融规模的变动对农民增收影响有限,农民收入是农村金融规模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是。农民收入提高,其储蓄也会随之增加,使农村金融规模变大,但农村金融规模的变动对农民增收作用有限,这说明我国农村存在资金外流现象,金融机构吸收当地农民存款后,主要用于外地的发展。

(2)农村信贷比率的增加对农民增收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信贷比率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农村信贷比率的增加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但农民收入并不是信贷水平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农业信贷并不会因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而增加,我国农村信贷仍存在区域不均衡现象。

(3)财政支农力度对于农民收入不产生显著影响,农民收入是财政支农力度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是。近年来,我国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但从本研究结果看,对于提升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明显,国家虽然对收入较低的贫困地区给予了大量财政支持,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政府通常因为一个地区过于贫困而给予财政扶持,但财政扶持对于农民增收效果不佳。

(4)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民收入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外出务工人数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是。通常低收入地区的农民会因为本地区的工作机会少,收入水平低选择外出务工来提高收入,高收入地区的农民通常外出务工人数较少。

(5)农民收入遇到外部冲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后,表现出较弱的误差修正效应。农民收入受到农村信贷水平、外出务工人数和自身的正向冲击后,会有所提高。农民收入受到财政支农的冲击后,当期有所改善,但长期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收入受到农村金融规模的冲击后,当期有所改善,长期效果不明显。

针对本研究结论,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第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拓宽金融服务范围和领域,简化质押、信贷、放款流程,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第二,构建新型农村金融服务网络,不断完善金融服务设施,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布局规划,支持金

融机构进驻农村,增加惠农服务范围 and 民生金融产品,利用税收、财政等多种手段,建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农村金融服务设施建设,根据居民分布等实际情况,增加自助服务设备。第三,统筹推进布局合理、高效有序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探索、创新符合农村地区的金融经营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各涉农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打造布局合理、竞争有序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2)整合拓展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第一,以我国目前农村现状为基础,加强农村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出台涉农信贷的财政扶持政策,使政府财政和农村金融机构共同支持涉农信贷的发展。第二,创新惠农服务及金融产品的研发,农村金融机构可广泛吸收农民的闲置资金、社会投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壮大自身资金实力的同时,激发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通过增强惠农支持力度,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第三,大力发展和推进农村高科技及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移动通讯技术、在线支付业务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和普及,可以为农村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开展网上银行及信贷业务,实行一体化网络化经营,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各金融机构重复建设、分布不对称、无效率运营、金融服务严重缺位的矛盾,同时也减少了农民对机构网点的过度依赖,足不出户即可享受金融服务。

(3)提高农业财政补贴效率。第一,加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财政投入力度,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基础设施以及农业现代化技术的投入,加大农业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投入,加快从小农经济向农业现代化转变的进程,提升第一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减少农业财政支出及补贴的中间环节,改变现有分散的农业投入机制,整合各项支付支出,提高政府农业支出的使用效率,加强农业支出资金的监管,切实做到每一笔资金去向的透明。第三,建立农业财政支出效果评价体系,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证每一笔农业财政支出都能用到刀刃上。

(4)创造当地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当地就业积极性。第一,政府完善扶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通过市场化运作建立起促进农民当地就业的长效机制,提高农民当地就业的积极性。第二,打造解决农民当地就业问题的服务平台,方便农民就地找到工作机会,可通过定期举办招聘会,建立专门的农民农业人力资源市场,开通农民就业信息网,开设当地农民就业微信平台等方法,为农民就业提供便利。第三,建立和完善农民维权服务和维权监督机制,对于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绝不姑息,通过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解决农民后顾之忧,吸引当地乃至外地农民前来就业。第四,政府应加强农民创业培训,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鼓励有技术、有想法、有资金实力的农民创业,并给予一定的政策、税收优惠。通过鼓励农民创业,创造就业岗位,解决当地农民就业问题。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其他人共同走向富裕。

参考文献:

- [1]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求知,2003(3):23-26.

黄德金. 新常态下粮食核心区战略推进的路径思考——基于河南省农民增收与保障视角[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9): 276–280.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9.073

新常态下粮食核心区战略推进的路径思考 ——基于河南省农民增收与保障视角

黄德金^{1,2}

(1.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2. 河南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1)

摘要:新常态下的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战略全局。粮食核心区战略的实施,对提升国家粮食总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河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积极推进粮食核心区战略,确保了粮食产量“十二连增”,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采用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并以河南省为例探讨粮食核心区战略的实施效果。提出在农业生产资源约束趋紧的客观条件下,发展粮食生产必须依靠人力资源,认为做好激励、实现增收、完善保障是此中应有之义。建议要构建敬农爱农的价值认同,激励优秀农业人才干事创业;鼓励合理的人员流动和土地流转,提高农村人力资源使用效率;推进农民增收与保障工程,解除农民种粮的后顾之忧;优化农村和农业政策环境,构筑保粮增粮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核心区;农业人力资源;农民增收;民生保障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09-0276-05

粮食生产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粮食安全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再次提出粮食安全问题,指出到2020年,现代农业建设

取得明显进展,粮食产能进一步巩固提升,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产品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十三五”规划建议也着重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可以说粮食安全是近年来被社会所广泛专注的一个字眼,从总书记的多次表态,到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年关注,再到国家规划的着重安排,不难看出其身上所承载的沉甸甸的祈望。民以食为天,粮乃国之基,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保障我国粮食安

收稿日期:2016-05-27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计划(编号:152400410479)。

作者简介:黄德金(1980—),男,辽宁大连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理论及政策研究。E-mail:dejinhuang@163.com。

[2]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J]. 经济评论, 2005(3): 39–45.

[3]高 艳.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绩效分析[J]. 金融研究, 2007(12): 242–246.

[4]Greenwood J, Jovanovic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1076–1107.

[5]Banerjee A V, 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2): 274–298.

[6]Clarke G R G, Xu L C, Zou H F.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J]. Ssm Electronic Journal, 2003, 72(3): 578–596.

[7]林毅夫. 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R]. 北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3.

[8]许崇正, 高希武. 农村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支持状况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05(9): 173–185.

[9]温 涛, 冉光和, 熊德平.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 2005(9): 30–43.

[10]杨小玲.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实证研究[J]. 经济

问题探索, 2009(12): 71–77.

[11]谭燕芝.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关系的实证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09(4): 50–57.

[12]余新平, 熊晶白, 熊德平.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6): 77–96.

[13]李明贤, 叶慧敏.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4(4): 88–97.

[14]刘玉春, 修长柏, 贾凤菊.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研究, 2016(2): 63–67.

[15]胡 俊, 许正松. 农村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农民收入——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研究[J]. 企业经济, 2015(11): 188–192.

[16]朱湖根, 万伦来, 金 炎. 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12): 28–34.

[17]杜 婕, 霍 焰.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与冲击[J]. 经济问题, 2013(3): 97–102.

[18]段成荣, 杨 舸.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 人口研究, 2008, 32(5): 15–25.

[19]赵进文. 面板数据建模理论的去、现在与未来[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9): 149–160.